

本 辑 特 载

关于创新文史资料工作的思考

张玉权

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在于坚持与时俱进。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从创立到发展，都贯穿着这种精神，其集中表现就是两个字：创新。

40 多年前，周恩来同志倡导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就充分显示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创造精神。40 多年来，这项工作的开展由主要在全国、省及部分城市政协发展到全国各级政协，征集的时间范围由建国以前延伸到建国以后，出版的内容由选辑趋向专题化、系统化，撰稿的人士由大陆范围以内扩大到大陆范围以外，这也是不断创新的结果。现在，我们进入了新世纪，文史资料工作要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就必须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进一步开拓创新，不断适应新形势，形成新理念，研究新课题，开创新局面，使之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

必须适应新形势

正确认识新形势，努力适应新形势，这是创新文史资料工

作的前提。

新的世纪，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各项工作包括文史资料工作都将面临新形势的挑战。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把先进文化作为灵魂和旗帜，强调必须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则是实现这一制度的重要机构。

文史资料工作是历史科学的重要内容。而新的世纪将是我们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阶段，人们必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审视历史进程，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发展将会成为新的潮流，新的史学理论、新的史学范畴、新的史学研究门类和课题等将会不断涌现。

总之，我们必须充分地看到，自文史资料工作创立的 40 多年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和统一战线、人民政协有了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历史科学与文史资料本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与发展；必须充分地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新的形势、新的要求、新的实践向文史资料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必须充分地看到，文史资料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要看它在发展先进文化、完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繁荣历史科学中所发挥的实际而又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站在新的认识高度，来把握、谋划和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推进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和研究，与时俱进的向前发展。

必须突出新特征

特征是性质的体现。准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文史资料的新特征，是创新文史资料工作的基础。

所谓文史资料就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人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史料。政协文史资料是具有统一战线特点的近现代史资料。文史资料的特征不仅同人民政协的性质密切相联，而且从根本上讲是由人民政协的性质所决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协是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存在的。所以，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概括文史资料具有统战特点和“三亲”特色，这是完全正确的。

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的性质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天的人民政协不仅是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而且是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机关，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统一战线要解决的是同盟军的问题，而民主政治则是属于国家政治制度范畴的问题。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文史资料的特征是由人民政协的性质决定的。人民政协的性质变化发展了，文史资料的性质也必然随着变化和发展。因此，仅仅讲统战特点已不可能涵盖文史资料的全部特征了。新时期的文史资料不仅要继续强调统战特点，而且要突出强调民主政治特征，这就是多党合作特征、政治协商特征、参政议政特征，一句话，必须突出政协特征。李瑞环同志强调指出：文史资料“要始终注意选好角度，发挥优势，体现政协文史资料的特点”。这是对新时期政协文史资料特征的精辟概括。只有突出这一特征，才能使文史资料工作的领域更广阔，内容更鲜明，重点更突出，意义更重大。充分认识和自觉坚持文史资料的政协特征，对于进一步做好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和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必须赋予新任务

任务就是肩负的工作。要创新文史资料工作，说到底就是要创新文史资料工作的任务。

按照政协《章程》的规定，文史资料工作的任务是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⁴⁰多年来，在全国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文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征集、出版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宗教、华侨、外交、社会等各方面的宝贵史料，对于党史、国史、军史以及地方史的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史料征集、出版中强调写统一战线的人和事，所以文史资料记录和反映了统一战线的历史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我们必须站在这一新的高度，来进一步思考文史资料工作的任务和重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实现这一制度的重要机关——人民政协，都是我国独创的。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对这一政治制度及其机构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和总结，充分发挥其优势。文史资料不仅应当肩负起这一重要历史责任，而且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突出这一重点，撰写这一史料，总结这一经验。要在继续记录和反映统一战线人和事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重点，着力记录和反映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和人民政协与民主党派、工商联共同发展的历史，提供内容丰富、

科学性强的史料，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人民政协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存史。显然，只要创新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任务，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史资料的天地将无限广阔，它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补文献之不足，而是要建立多党合作史、政治协商史、参政议政史，也就是基本政治制度史，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服务。

本 辑 专 稿

蕪春籍国民党将军人物小传

张梁森 编整

【编者按】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在“广泛开发蕪春人文资源，振兴蕪春经济”的口号下，人们对蕪春近代、现代各类人才进行系统考察，得出了一个令世人惊叹的结论：蕪春县是一个文昌之乡，称为“教授县”。尔后，教授县逐渐被世人公认，且享誉海内外，也的确为振兴蕪春经济带来了生机活力。

然而，蕪春县何尝只出教授？在这个钟灵毓秀之地，素来就是“英杰代兴”，“人物彬彬”。蕪春县不是只有文人、学者、专家、教授，而是各类人才应有尽有。本文作者在长期的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中，通过与各方面人士、尤其是统战人士的交往、叙谈，以及查阅大量的文献史料、地域方志和氏族谱牒等资料，了解到蕪春县有一大批俊杰之士，他们或起自行伍，或投笔从戎，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跨入战场，冲锋陷阵，为国为民立下汗马功劳，甚至流血捐躯，视死如归。当然，这些人中，由于所处时代不同，身世攸关，或成为疆场英雄，或成为历史罪人，对此谁人曾与评说？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足矣！

本文作者作为对蕪春历史人物研究的需要，致力于做好统

一战线工作，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建设，特将蕲春籍国民党少将以上的将军人物史料逐一编整，无所褒贬，留待读者自由评说而矣。

第一部份 中将 7 人（以生卒年代为序）

方觉慧

方觉慧（1886~1958），字子樵，蕲春县赤东镇方上湾人。幼读经史，早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考入黄州府中学堂，与同学、同乡詹大悲等人组织“证人学会”，宣传反清思想，1908年被校方开除。1911年参加武昌辛亥首义，时为《大江报》特约编撰；同时参加“文学社”革命活动为顾问；曾参与汉口保卫战，后任鄂军政府参议兼《中华民国公报》编辑。

“二次革命”失败后，避难于上海。191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其间加入中华革命党。次年回国，任中华革命党驻汉特派员，组织中华革命党分部。中途潜回家乡，以祖业田产抵押借款，招殷永包粤汉铁路桥梁涵洞工程，藉作掩护，联络各方，并为隐蔽于各路段工程地区秘密活动的革命党人提供生活和活动费用。袁世凯称帝，方负责策动警察反正讨袁。1917年，奉孙中山之命赴湘西联络常德镇守护蔡巨猷，梯队团司令廖湘云响应护法。11月，任鄂湘招抚特派员。1920年，在许崇智军中任职，负责总务。1921年，任广州大本营宣传处新闻主任，并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陈炯明叛变后，赴闽收编张清雨部队。其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等十一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训练部副主任等职。1926年参加北伐，任江汉宣抚副使，后任新编十师少将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同年夏，奉广

州国民政府军委会命，赴湘鄂边境收编夏斗寅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1927年，任新编十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继续参加北伐，任国民党南京市特别党部主任常委、立法院委员，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主任。1929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一度代理民政厅长，并暂代湖北省政府主席（因主席李春萱未到职）。同年当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并连选连任至第六届。1930年，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1931年2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推荐方为四川区视察委员。1933年，任中央党部地方自治计划委员会主委兼鲁豫监察使，后任宪政督导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方一度请缨抗日，为蒋介石所忌。1937年，改派为华北党务特派员。1940年，任中央党政委员会党务组组长。1941年，任中央党政考核委员会陕豫区考核团长。1944年，任广东省党部主任委员。1946年，改任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旋被选为国大代表。方觉慧身于宦海多年，却颇重乡谊。曾为胡风、方瀚（何定华）提供掩护，资助船费赴日本避难。中共地方武装领导人方敏（建国后曾任某军政委、后为南京市委书记）于中原突围后潜入武汉，方设法使其乘轮船安抵南京，找到中共代表团后转回解放区。1949年由武汉去香港，住九龙一年余，家有十口之众，生活困难，与千国勋等人自己动手盖房种菜。同去还有刘文焕、程定远、方志平、王培礼、曹士杰、张弥川、艾时、杨啸伊、张刚、胡宗铎、涂思宗、宣铁吾等。1953年去台，仍担任“国大”代表。1954年参加“国大会”，当选为主席团主席。1958年10月10日病逝于台湾。

方觉慧在港台期间，转入潜心著述，且平生癖好古玩，信奉佛教。著有《明太祖武功记》、《每子绎义》、《孔子编年记》、《国父开国纪年史稿》、《周秦学系》、《两汉学系》、《孔子仁道

哲学》、《大同仁道哲学》、《孔子论礼辑要》、《老子道德经解》、诸书。另有《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完成于抗战时期。其妻孙健吾，育有二女二子。长女肇岳，次女肇恒、子定一等，均侨居美国。

邓 英

邓英（1893~1953）亦名剑豪。蕲州（今蕲春县蕲州镇）馒头尖人。1910年（清宣统二年）考入湖北陆军小学读书，后升陆军中学。1914年（民国三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深造。同学有刘峙、何成浚等。毕业后，先后在寇英杰部当排长、连长、再升营长。1928年转李纪才部任参谋长。尔后不久，蒋介石将李纪才部收编成为混成旅，任命邓英为旅长，属河南督军主任兼河南省主席刘峙统辖。邓因与刘是同学，刘改任其为16旅旅长，旅升为新5师副师长，并派往湖北鄂东地区执行“绥靖”任务。1930年，邓升任新编13师师长，晋升为中将军衔，可谓荣耀。

但邓英并不很为蒋介石卖力，而总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因为他在鄂东“绥靖”时，曾在家乡蕲春等县招了两个团的新兵，并提拔了一批乡亲当军官。如团长胡迈千（刘河人）、叶巨声（浠水人，住蕲春，邓英的妹夫）、黄近文（莲花庵人）。又如胡近一、陈汉存、黄天玄、宋龙骧、詹学臣等蕲春人，都在邓英属下当官佐。因此，其部队官职多于其他部队。有人嘲笑邓英部队说：“邓英的兵有三多：官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多于子弹。”又讥讽他：“邓英部，公子兵；穿的鞋，格外新；听枪响，头发昏。”可见邓部的战斗力极其脆弱。1930年2月8日，邓英奉调到江西“围剿”红军，他深知红军善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保存自己部队，害怕与红军部队打仗，甚至不

敢“接触”。10月初，蒋介石、鲁涤平命令邓英部队从吉安出发，前进40里“围剿”红军。而邓英本来就知道吉安城孤立无援，吉安作为江西一个较大的城市、只有他的3个团兵力，而周围太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都没有驻军，只有当地的所谓靖卫团，哪堪红军一击。所以，共产党地方武装力量先后“八次攻吉”，实际上是8次佯攻，用政治攻势打击敌人。致使邓英部士气低落，全无斗志。这时，蒋介石、鲁涤平叫他去打红军，那不是白白送死吗？于是，他令部队于10月3日前悄悄乘船沿赣江北航，退到南昌去了。10月4日凌晨，红军攻城部队一枪未发就顺利的占领了吉安。吉安周围的太和、安福、吉水等几个县城的敌“靖卫团”也吓破了胆，都一古脑儿地逃跑了，使我们赣南红色根据地连成一片。接着，红20军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和红22军军长陈毅同时率两军进驻吉安集结，使吉安周围数十里红旗飘扬。

其实，攻打吉安是毛主席（当时的毛委员）决定的。1930年，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在宜春开了个会，这就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袁州会议”。会议认为，打下吉安，可以使广大红色区域连城一片，发展土地革命，扩大根据地。于是决定回师攻打吉安。军团总部于9月29日在宜春发令：20日向吉安进发！而当天晚上，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来了，要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经毛泽东同志再三说服，执行“立三路线”的长江局代表周以粟终于放弃原来的意见，接受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积极拥护攻打吉安的决定。所以，才有1930年10月4日红军不废一枪一弹而顺利占领吉安的胜利。后来，毛主席于1936年12月在陕北红军大学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谈到“集中兵力”而举出打吉安的例子说：“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

师)自己逃走了”(见《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第208页,19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点名的这个括号中“邓英师”的邓英是谁?就是当时国民党中将、蕲春人邓英师长。

邓英师长退到南昌后,他先向“围剿”红军总司令鲁涤平陈述理由,鲁大为愤恨。当蒋介石得知邓英放弃吉安后,更加震怒,当即赏了邓英两个耳光,立命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将邓英撤职查办并打入监狱,要枪毙邓英,其部队转由路孝忱师长统辖。还是他的同学刘峙、何成浚以及国民党左派将领邵力子、张治中、耿伯钊等,向蒋介石求情具保,才使邓英幸免一死。但还是在南京陆军监狱监禁一年多。邓曾自思: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且在吉安时不为蒋买力,有人在蒋面前“告御状”,加上此次触蒋暴怒,前景自然不会看好,只待自谋生路罢了。

邓英出狱后,得到朋友和社会有关人士的资助,在上海买了一套房子居住下来,不问外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八·一三”战斗打响,邓英从上海迁到武汉暂住。其间有一次,日本驻汉领事请邓英赴宴,酒席间他与日领事有一段对话。

领事问:邓将军,蒋对抗战是什么态度?

邓答:我已离军界,蒋是什么打算我不知道。

领事又问:你对“大东亚共荣”是怎么看的?

邓答: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我也说不准。

领事再问:你对“大东亚共荣”能作点支持吗?

邓答:我是中国人,不能让后人骂我。

可见邓英离开军界不问世事并不虚传,而其民族自尊心仍然存在。

1937年,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并未忘记邓英这位中将军长。恢复他的官职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要他迁往重庆

长寿县居住。这其实是蒋介石对邓英不放心。抗战胜利后，邓英又迁回上海。当内战爆发时，邓英更加心灰意冷，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他只过着独自的清静无为的生活，直至全国解放。

解放后，邓英回到家乡蕪州，时值土改运动，邓受到冲击，经济上发生困难。有一次，他找到当时的何启县长诉说个人境况：“我邓英是犯了蒋介石的军法坐过牢的人，对革命还有点帮助。我现在有得钱用，也有得钱抽烟……”何县长答应了他的要求，派专人对其生活予以照顾，直到他1953年8月于县城漕河病逝。邓英遗有3子3女：长子世均居安徽、次世镛居澳门，三世铎居上海。长女世琪居美国，二世珩、三世琛均居上海。1986年，子女们将其父邓英葬在蕪州冷水井的坟墓重新修葺，并刻碑纪念。蕪州人谁也没有忘记邓英这位被毛泽东主席点过名的国民党将军。

曹天铎

曹天铎（1894~1948），又名伟生，蕪春县清水河（今属漕河镇）柏树湾人。慕本乡田河村革命党人田桐、田桓兄弟之为人，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早年即加入同盟会，开始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后，曹极为义愤，又随国父孙中山积极参加“护法”讨袁之斗争。1934年，曹天铎因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与同乡伍国栋、高鹏（均已故）等被捕，并在武昌监狱约两年多。1936年“西安事变后”，曹获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战，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主要力量。1941年由李济深亲自推荐到李宗仁任司令长官的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任中将参议。其间，曹天铎曾奉派出驻在蕪春

县漕河的39军军部协助军务，多次劝说军长夏辉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密令明从暗抗。曹莅薪期间，曾同活动于蕲黄广等地的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张体学旅长等秘密接触，商谈有关抗日救亡事宜。

抗战胜利后，曹为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为民主而积极奔走。1947年1月，作为湖北省代表赴香港参加国民党民主派会议，商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被选为“民革”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同时是湖北地区民革、民进负责人之一。

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军队许多高级将领经过“策反”而起义投诚。此间，曹天铎奉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之命，持李的亲笔信从武汉到麻城宋埠，策动白崇禧部的第三兵团司令张淦起义。因为张淦原为李济深的部下，李估计其会归顺的。张淦却阳奉阴违，密将曹天铎拖住让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押解南京后，从此下落不明。李济深推测曹可能在南京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曾给曹天铎的子女们回复有关信函。信中说，曹天铎“肯定属于革命者”。

方 霖

方霖(1903~1983)，又名楚浓，化名施时雨。蕲春县赤东镇苏圩方选堉人。5岁时由务农的父亲教他识字，7岁时进私塾读书，其祖父松甫即为塾师。10岁时入竹瓦店毓俊学校，是蕲春早期教育家朱义第先生所创办的新学。14岁入县高等小学，17岁考入广济县南山中学。毕业后，谋职为小学教员，并从舅父黄柳眉先生学医。

1925年，大革命兴起，方霖此时在蕲春县安平乡（今赤东、清水河一带）任文牍。本年秋，他的叔父方觉慧（时在广

州大本营宣传处任职)给他带信叫他到广州。经叔父介绍,方霖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深造。不久就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宣传员。1926年,方霖转入湖南的夏斗寅部并随之赴宜昌,在该干训班任文书同时受训。至这年夏,离开夏斗寅部,转入地方任国民党宜昌县党部录事。3个月后再迁宜昌县总工会司书。是年冬,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助理员。

1927年初,方霖在中华总工会受训3个月,结业后派为汉口燃料总工会特派员。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驻汉口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桂系)李品仙,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组织开刀,汉口各工会组织相继解散。方霖通过其堂兄方楚奇(时任35军兵站支部主任)拉关系,谋到35军第一师兵站部中尉站员一职,并随军“东征”蒋介石。“东征”失败后,方霖离开何健部到南京找叔父方觉慧。1928年初,经方觉慧介绍,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机要科任准尉司书。不久,又调到国民革命军日报社印刷所充少尉管理员。

1928年4月,是方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此时经方觉慧介绍加入国民党,不久即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后改为黄埔军校第六期)政治科再造。他自认为在这里“经过法西斯的毒化教育,满脑子灌入了升官发财的思想。”并错误的“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是代表孙中山先生实行三民主义的。”所以,他才有向蒋介石效忠、为蒋介石卖命的忠诚。1929年末,他从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毕业。1930年春,被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实习并兼任国军第九师第27旅国民党党部筹备员。实习完毕调派大冶县总工会委员。1931年改任宜昌县党部委员兼《中山时报》社社长。1932年初,方霖再度被派入南京军校团队训练班受训,结业后分配到国民党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任政训处员并派任河南信阳第15路军第35师政训处中校处员。1933年夏,又调入湖北省保卫

处任谍报股股员，在此加入国民党要害部门“中统”，正式成为一名中统特务，且青云直上。至这年秋即升为鄂西谍报专员兼宜昌《民声日报》社社长。1935年初，又加入“军统”组织，是为双重特务身份。年冬，升调国民党鄂东“清剿”指挥部特务队副队长兼壮丁训练教官。1936年夏，再升迁为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校督察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方霖即调升为华北五省市党务指导专员办事处调查课课长，并兼任军委会第六部驻战区第一办事处第4科上校科长一直至1938年5月。此期间，他曾派遣大批特务在华北各地收集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各方面情报，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力。

从1938年6月至1939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方霖离开军政界住进四川万县做一项特别工作，即协助其叔父方觉慧撰写《明太祖革命武功记》，用以吹捧蒋介石，再缘阶梯向上攀。1939年10月即到重庆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党务组第二科上校科长且兼战委书刊编审委员会总干事，负责主编《党政月刊》，宣传反共，鼓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2年初直接入国府参谋院任上校参议，2月即晋升为军委会政治部二厅少将秘书长兼二厅研究室少将主任、政治部少将部副等。此时，他真正由一个普通学生进入了将军行列。任少将时年40岁。此时可说是他春风得意，已经接近到主子（蒋介石）身边了。

抗战胜利后，国府重新迁返南京。蒋介石撕毁协定，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方霖又配上用场。1946年初，他回到武汉担任武汉行营政务处第二科少将科长。是秋，派为湖北省临时“清乡”督导组第一组组长，督导全省所谓“清乡”活动，不遗余力。他曾召开鄂东各县县长会议，部署“联防”，妄图阻止解放，又得主子欢心。于1947年冬直调任武汉行辕总务

处少将副处长。1948年8月转调长沙绥靖公署总务处少将副处长。本年6月，长沙绥署迁往邵阳，方霖被提升为中将代处长，这是他平生中官阶（军衔）最高时期，时年46岁。至1949年8月，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革命潮流席卷大江南北，长沙绥署主任程潜先生宣布起义，投向人民。而方霖却顽固不化，他逃到四川与成都稽查处周迅予组建“反共救国军”，并任第三纵队“司令”还兼四川省警察局督察专员，誓与人民反抗到底。但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惊涛骇浪冲破了他的迷梦，1949年12月25日，四川警察局集体起义，方霖才无可奈何花落去，也只好成为起义队伍中的一员。

方霖起义后，先在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警训大队及政训班等地集训学习，1950年10月我公安部门对其依法逮捕，1951年7月由四川省川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行判处无期徒刑且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尔后20多年间，他和其他服刑人员一起进行劳动改造。1972年被减为有期徒刑15年，1975年12月正式释放并予以公民权利。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6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鉴于“方霖起义后未犯新罪，根据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撤销原川西人民法院一九五一年对方霖的刑事判定”；对方霖按起义人员对待。”

方霖被释并恢复公民权后，他仍然回到家乡蕲春县并选择在蕲州镇定居，他愿意和家里亲人们团聚，求得叶落归根。党和人民政府对其给予宽怀照顾，安排他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研究员。1981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蕲春县第一届委员会正式成立，方霖被推荐为蕲春县第一届政协委员。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他担任县政协委员后，重新认识自己，痛悔平生罪衍，决心为祖国的统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虽然80岁高龄了，但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向在台湾、海外的亲朋故旧写信，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沟通信息联

系，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的一份责任。在最后几年的时间里，方霖老先生争分夺秒写出了近10万字的文史资料送给县政协。临终前还再三要求将他的存款2000块钱捐献给县政协。体现了方霖老先生重新做人，为国效劳的真心实意。

1983年4月13日，方霖老先生病逝于蕪州李时珍医院，经年81岁。4月15日，蕪春县蕪州镇人民政府为方霖老先生举行追悼会，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县政协、县委统战部都派员参加，让方霖老先生得到终生的安慰。

石补天

石补天（1908~1994）又名连升，号钟湘，蕪春县漕河镇（原清水河乡）大路铺村石车盘湾人。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926年于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与原配高氏结婚。1927年上半年，与同乡人石耀坤、田剑农、李佑加等在田河筹办农民协会，积极组织革命活动。因人告密而被捕，经房族户长出面保释。同年8月，他离家去武昌扫街谋生。1928年春，同乡有一姓石名补填的同学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七期，因突然生病而不能按时入校。石连升则改名为石补天顶替入学（实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科）。1930年10月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国府警卫旅任见习教官，1931年在浙江嘉兴第四团充少尉，旋即晋升为试署中尉排长。1932年在上海“一二·八”战役中，与日寇在江湾竹园墩激战七天七夜而负伤，晋升为上尉连长。1937年任58师523团2营营长，率部参加上海“八·一三”战役，在太仓与日军台湾旅团激战获胜，缴获枪械、军用品28担之多。同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固守牛首山受伤，撤退到燕子矶，卧木排渡江，通过日兵舰封锁线，至仪征县上岸，抛杖跛行，长途跋涉，在宿县搭上最后一班铁甲车，从徐州至开封